

两会热点

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短缺亟待破局

□ 本报记者 黄浩

“当前我县教师编制是按照2003年编制标准执行，2003年以来全县教师编制一直未增加，而学生总数却大幅增长。现有编制不能满足我县教育发展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履职期间，曾牵头在河南某县进行一项关于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的调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当地城镇中小学“大量编制外用工，教师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今年两会，张志勇特别就此问题带来了相关议案。

近年来，受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影响，我国学龄人口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从乡村地区向城镇地区

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强，大中城市、县城教育人口快速增加，形成乡村学校“生少师多”局面，而这些学校超编的教师，因各种原因却无法从学龄人口流出地区有效转移到城镇地区，导致城镇中小学不得不大量编外用工，给城镇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挑战。

“城镇中小学编外用工现象越来越严重，且编外教师工资待遇低、稳定性差。”同样关心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短缺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表示，这一现状导致编外教师思想不稳定、流动性大，不能满足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持续提高教

育质量的时代要求。

张志勇表示，地方教育部门呼吁高度重视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外大量使用教师问题，认为这种局面不仅影响教师队伍稳定和长远建设，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而且长期下去这类教师规模越来越大，可能会“积重难返”。

为此，两位心系教育的代表、委员都建议，国家应适应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的需要，从战略高度完善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政策，用三至五年时间解决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短缺问题。

“现行中小学教师编制国家

标准执行的是2001年的城市标准。随着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小学增设了信息技术、综合实践活动、通用技术、心理健康教育等10多门课程；新一轮高考改革，推动普通高中‘选课走班’带来‘小班化’和‘走班教学’改革趋势，都需要增配适量教师。”孙惠玲说，当前亟须出台教师编制新标准。

同时，孙惠玲还建议建立“省级统筹、市域调控、县级使用”的中小学教师编制管理体制。根据学龄人口流动趋势，加大县域、市域间教师编制调控力度，“比如可以由市级统筹分散闲置编制资源，盘活市属高校、其他事业单

位现有空编，建立编制‘周转池’，及时向急需区域、学校定向定量投放”。

张志勇也建议，通过优化教师编制核定周期，健全教师编制年度统筹制度，建立教师编制资源刚性管理制度等措施，逐步扩充城镇中小学教师编制。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学生数量增长情况，完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核定全省编制总量，建议调整周期不得超过3年。同时，督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内，根据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不同学段学生规模变化等情况，充分考虑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

城镇学校的实际需求，实行按年度统筹调配县区内学校编制分配使用计划，提高编制使用效率。”张志勇说。

针对编内编外教师待遇差距过大的问题，两位代表委员还建议，用三至五年时间，逐步做到编外教师与编内教师在工资待遇、各种津补贴、奖励工资、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同工同酬，以稳定编外教师队伍。

“编制外使用的这一部分教师虽然能够缓解燃眉之急，但存在准入制度不规范、待遇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情况，不能满足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要求。”张志勇表示，“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倪闽景：基础教育要抓“近视率”这个“关键指标”

□ 本报记者 黄浩

“近年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呈现低龄、深度近视的趋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特别关注到孩子的近视问题。

据了解，我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52%以上。2021年，教育部等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确保到2025年每年持续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到2030年实现中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青少年近视是个复杂问题，只有针对关键要素采取行动，综合施策，发动各方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工作目标。”倪闽景说。

为此，倪闽景建议将青少年近视

率纳入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首先要抓住近视率这个核心指标，引导社会观念转变。近视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老师、家长、学生对健康第一并没有真正理解到位，对近视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倪闽景表示，要把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地区教育质量考核的重要指标。如果不达标，学校和区域领导要被严肃追责，每年在主流媒体公布各地区青少年视力报告和近视率，接受社会监督。

此外，倪闽景还建议加强医教结合，提高近视预防宣传和防控的科学性。教育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合作，推进视力监测、眼轴长度、屈光发育档案全覆盖，及时发现和干预近视发病。

针对目前社会普遍对于近视防控感觉“束手无策”的情况，倪闽景认为近视防控是有可行办法的。“近视成因虽然与学生课业负担、用眼习惯、灯光照明、户外活动、电子产品使用等很多因素有关，但最相关的是户外活动时

间。”为此，倪闽景建议要抓户外活动这个核心行为。据了解，此前上海在2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实践表明，保证学生户外活动时间两个小时以上的学校，学生近视率下降了30%。

倪闽景表示，保证学生的户外活动需要有更充分的体育运动场地，但是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学校体育场地设施不达标问题十分严重，需要开展专项建设；同时教室灯光照明不达标十分普遍，要按照国家新的教室灯光照明标准，分阶段落实教室灯光达标工程；拓展放学后孩子在社区的运动空间，让孩子在住宅小区里可以开展各种户外运动和游戏活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抓关键指标，大学抓就业率，基础教育应该抓近视率。近视率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牛鼻子’，抓住这个‘牛鼻子’，基础教育的许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近视率下降之时，就是基础教育的教育生态真正转好的开始，教育焦虑和教育内卷真正得到根本改变的开始。”倪闽景说。



人大代表“回乡”履职
全国人大代表董彩云长期在基层学校任教，近年来不断为西部乡村教育发声，她曾提出加强贫困地区人才和师资培养、为贫困地区规划高校定向招生等30多条建议。图为两会前夕，董彩云回到曾经任教过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吹麻滩小学调研乡村教育。（新华社记者 范培坤/摄）

(上接1版)

面对检查多、会议多等老问题，许玲则建议，由教育部门牵头梳理清查各项督查、检查、评比等项目，精简会议、文件，取消重复上报数据和多头填写表格，避免摊派过多教学以外的工作任务，让教师能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职、本位，高质量落实教书育人工作。

提待遇、扩师资、强培训：走好减负“三步棋”

“‘双减’之后，如果教师工作时间延长了近2个小时，就相当于增加了

两会代表委员呼吁：多管齐下解放教师时间

1/4或1/5的工作时间。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增加的工作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机制，或者有相应的教师编制补充机制。如果没有类似的补充机制，可能会出现一批优秀教师流失，‘双减’反弹的压力会增加。”戴立益在提案中建议，应该从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方面缓解目前教师负担过重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

实验小学教师吴明兰今年带来了对教师额外付出的劳动给予报酬和建立奖励激励制度的建议，她表示，可以根据教师工作成果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此外，她建议督促省级部门尽快落实课后服务收费政策，并确保所收取的费用完全用于教师课后服务，确保课后服务可持续发展。

待遇提上去，额外付出才有动力。民进中央还建议，对课后服务工作表现突出的教师，可以探索优先晋升职称和评优评先。学校根据发展实际积极创新保障措施，提升服务效能，切实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随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教师轮岗的需求加大，“双减”之下公办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进一步凸显。民进中央注意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

教师短缺问题已经很突出。

为此，民进中央建议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加强优质师资供给。建议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规范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

提待遇、扩师资，无疑是减轻“双减”下教师负担的好办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表示，“双减”之下，需要高度重视加强

教师集体教研活动。“过去3点半放学后，教师有比较充足的集体教研时间，但现在不少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缺少了集体教研的时间。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教师集体教研活动的制度设计。”而在许玲看来，分层、分类、分岗开展教研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也必不可少。

“‘双减’后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使得教师开展教研等活动的空间被大幅压缩，教师专业发展和工作生活均面临较大压力。我建议针对‘双减’政策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对在任教师开展针对性培训。”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

(上接1版)

用课程开发撬动育人方式的转变

中国教师报：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多学科融合和个性化课程的开发也成为教师的新课题，学校和教师该如何应对？

王欢：最重要的是改变教师的课程观。课程开发要求我们用10%的综合课程来撬动90%的国家课程，但我觉得它的变化撬动的是育人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综合课程的研发，但实际上是通过课程让学生发现、设计、解决问题，从而提高解决真实问题的

能力。比如史家教育集团几年前通过15个领袖教师团队开发了一套教材，当时选择的是针对国家文物进行研究和开发，就是希望打破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通过参与、研究、探究，在共同合作的过程中形成其综合能力。

陈如平：总的来看，开设个性化课程是国内外教育的一个趋势，这些年来在国内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个性化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使得中小学课程结构的弹性、适应性、选择性增加了许多。在“双减”工作推进过程中，我们也要考虑减了其他负担

后，怎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成长的需求，这应该作为很重要的考量。

发挥教科研优势，家校社协同发展

中国教师报：“双减”让学生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家长和教师的压力却在悄然增加，那么从政策层面该如何提升教师的育人能力，让其收获成长的幸福？

陈如平：首先，在教师管理或队伍建设上，必须利用思政工作提高教师对教育教学和育人工作的认识高度。其次，在不同学段、不同地区，针对不同层级、不同能力水平的教师要求是不太一样的，不能泛泛而谈。因此，在“双减”背景下，我们要具象化描述怎样提高某学校某方面的能力或提高某一学段教师某方面的能力，才能在研究、分析、解决问题时拿出比较好的办法来。同时，教研机构也应在广泛、大量、科学的研究基础上，拿出一些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指导教师成长的办法。再次，教师可以

借力教育信息化的创新技术来改进育人和教育教学方式，这跟“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减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简单的记事这些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整合比较好的信息管理平台来解决。

中国教师报：构建良好的“双减”教育生态不是教师一个群体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那么，家校社如何协同发力才能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呢？

王欢：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来源越来越多，家长的视野开阔了，对教育、教师的期待也就越来越高，无形中给教师带来了许多压力，尤其是一些新工作不久的教师。所以我们学校每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总是强调要跟家长达成共同的教育理念，在学

生的成长出现问题时，各担其责，不互相指责。教师要少动“恼”，多动脑，用适当的方式和方法与家长形成育人合力。

陈如平：家校社协同不是一句口号，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一些工作、行动来达到合力育人的目标。目前，我们的师范学校或教育学院在这方面的课程是比较欠缺的，因此建议学校尽快在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框架下，为教师补上提高家庭教育指导能力这一课。“双减”的最终目的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因此教师也应该激活自己，去学习、去提升、去创造。同时，推进“双减”的落实也要适当为教师“松绑减负”，提升教师自身的职业幸福感，从而走出一条“减负”与“提质”双赢的成长之路。